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研究動機

十六世紀基督新教在歐洲崛起，但二十世紀也在歐洲逐漸沒落，反而在亞洲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蓬勃發展起來。在亞洲國家中，韓國的基督新教於二十世紀初，因應脫離日本殖民所產生的民族自覺運動後，福音就不斷地火熱復興起來，直到現在在全世界基督教中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亞洲國家中，除韓國、新加坡等國之外，中國福音的崛起將是下一世紀的重點。特別在文革後，共產左傾無神唯物思逐漸鬆垮，中國人民及中國當局都正在尋找與建構新的思想價值體系。此時，不論是從中國內地產生起來，或是從海外傳播進去，福音的火確實已經在中國燃燒起來。在中國，基督教宗教已經逐漸凌駕在其他宗教信仰之上，成為人民的主要信仰。《Asia Time》指出以每天有一萬個中國人成為基督徒來算的話，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將成為全世界基督徒人數最多之地區<sup>1</sup>。但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則持比較保守的看法，認為中國基督徒不超過三千萬人，並且高速發展時期已過<sup>2</sup>。不過，八十年到九十年間，中國基督徒的激增是毫無疑問的，這讓筆者深以為有值得研究之價值。

此外，特別的是中國是屬於無神社會主義政體，在不支持與不鼓勵宗教發展之下，為因應眾多信徒的管理，不得不成立各宗教的愛國團體，同政府宗教事務局協助管理宗教。「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俗稱兩會)就是基督新教的愛國宗教團體<sup>3</sup>。在一般民主國家，因採取政教分離之政策，國家往往賦予相當甚

<sup>1</sup>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885&Itemid=110](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7885&Itemid=110)。〈每天增長一萬人：中國五十年內成全球最多基督徒國家〉，《亞洲時報》，撰文時間：2007.8.9。擷取時間：2008.9

<sup>2</sup> 梁家麟院長演講，講題為〈華人文化與中國教會的宣教前景〉，2008年7月19日於台北基督徒蘭雅禮拜堂舉行，由中福會舉辦。

<sup>3</sup>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成立，成為中國基督教的全國統一領導機構，並以自傳、自治、自養之三自主張來領導。所謂三自的基本意涵就是：福音由中國傳道人暨信徒來傳揚，中國教會由中國傳道人暨信徒來治理、中國教會的經濟由中國教會本身來承擔與管理，拒絕外國差會來中國傳福音、治理中國教會及奉獻中國教會。「中國基督教協會」於一九八〇年成立，成為中國基督教的統一教務機構，同時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職能分開。兩會組織、工作與三自的意涵部分，本章各節中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至絕對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各宗教團體都可以在無政治干涉狀況下，純粹地發展教務性工作。但在中國，因愛國宗教團體的政治色彩緣故，不得不接受政府某種程度的管理與控制，但又基於面對上帝信仰與信徒的期待，必須努力辦好教會之工作，所以當愛國宗教團體在成爲政府與教會之橋樑時，必然也會有兩邊拉扯的矛盾、衝突與妥協等。而愛國宗教團體如何因應與調整，隨著不同的中國政治局勢，必然也有不同的策略與方向。也許改變的速度不快，但以長時間來分析時，卻可看出明顯的改變，這是讓筆者覺得值得研究之處。所以，筆者決定從五十年代初(第一屆全國基督教會議)到九十年代末(第七屆全國基督教會議)作爲研究時間，希望在歷史的長河中看到中國兩會的變遷。

此外，筆者以爲只研究兩會的某部份是無法準確地看出其政治性與宗教性，必須較大範圍地來看。因此，筆者從兩會與政府關係、兩會與家庭教會關係、兩會與三自會信徒的關係、兩會與海外教會關係、以及兩會內部的宗旨與神學變遷等幾個層面來探討。本論文研究，並非站在海外反華立場去批判兩會親共之政治色彩，而是站在兩會本身去思考兩會真正面臨的困難，而在現實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兩會如何去克服這些問題及其演變等。

## 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 壹、研究問題（問題意識）

五十年代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張的三自運動充滿著濃厚的政治味，配合當時中共的排帝方向，教會也以切斷與西方之聯繫爲首要任務，而純教務性的工作要等到五八年宗派聯合後，才漸漸地推動。但不久因中共推行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左傾政策，宗教開始被壓制，宗教工作無法順利推動與進行，到文革時達到最高峰，直到八十年代四人幫跨台後，整個宗教工作才恢復。在此氛圍之下，基督教人士成立的「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雖不是政府機構，而是社會團體，但因政府支持並在背後主導的緣故，三自會很難脫離政治的影響。當然，當時爲了讓中國教

會能在中共之社會主義體制下生存，配合政治的立場是不得不的路徑。當時面對非三自的信徒，在緊張的排帝等政治壓力下，往往以與西方掛鉤之反革命理由加以壓制與迫害。

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教會於五十年代所推動的三自運動性質也逐漸從政治性的意涵轉向為宗教性的意涵，明顯的一點就是提出「辦好教會」的口號，即「傳好、治好、養好」。即使是以教會事務性的推展為八十年代後兩會的目標與方向，但整體上兩會還是無法跟政治完全切割，換言之，必須受制於中共中央的政策。當然，中共也清楚知道「宗教無小事」，在不能消滅宗教的前提之下，為了擴大團結愈來愈多的信徒，一起為社會主義、為國家建設奉獻，勢必也不得不改變五十年代的左傾、強勢壓制的作法才行。所以，中共於八十年代提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主張取代五十年的「宗教是鴉片」、「宗教與西方切斷關係」之立場，也就是說更務實地重視宗教工作，而非以無神論的意識型態蔑視宗教與宗教工作。八十年代後，中共雖給予比起五十年代更寬鬆的宗教自由，但中共深怕宗教勢力在急速擴充下，成為中共所擔心的反動團體，便以各種宗教政策來限制宗教自由，例如中共黨中央頒佈的〈十九號文件〉、〈六號文件〉、國務院發布的一四四號(中國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一四五號(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宗教事務條例〉等。特別又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法輪功事件等人權迫害事件後，中共的宗教政策更顯得緊縮。

在這樣的氣氛下，中國兩會不得不配合中共中央所主張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大前提，並在此前提下進行教會發展工作。但八十年代的兩會已經認知到，若只是一直強調政治性的訴求，而不著實地辦好教會的話，信徒是不會增加，所以兩會必須站在教會與信徒立場，與中共進行協調、建議或抗爭以爭取應有的權利與自由。所以，八十年代的兩會並不像五十年代時那樣完全順從於權威專制的中共，而是更站在教會的立場來思考。甚至，對家庭教會的態度也明顯地轉趨溫和、包容與團結。

到九十年代，因著兩會與海外的交流日益頻繁，有海外教會人士認為，兩會的三自已經淡化，甚至政治性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已經不須存在，只要保留

宗教性的「中國基督教協會」即可。連兩會內部新生代的領導者也曾有這樣的辯論。

此外，從根本的三自愛國運動的性質來看也有很大的改變，從五十年代強烈的政治性訴求轉變為八十年代後偏向宗教性的訴求。五十年代三自訴求是相當地深化在中國之內，因為要切斷與西方聯繫，到八十年代之後中國教會早已獨立，三自反而逐漸淡化。中國兩會中保守分子依然堅持三自愛國的必要性，但似乎對廣大的基層信徒或自由份子而言，三自已經不是那麼重要，更沒有如同五十年代的切身感受<sup>4</sup>，如此也連帶影響與非三自的家庭教會的關係。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不再是「零合」的對立關係，而是兼有合作、競爭等複雜關係<sup>5</sup>。

所以本論文以為，中國兩會雖必須受限於無神論中共一定程度的宰制，但畢竟環境與時代愈趨開放，兩會的自我認知、方向、功能必定會調整，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發展必定不同。所以，不能直線性地認為中國兩會都是政治性地被使用，是政府打壓家庭教會的打手，而沒有宗教自主性發展空間等。兩會在面對政治性的中共及面對教會與信徒之間常在掙扎，換言之，必須面對神，也必須面對現實的政治，因為兩邊都會影響兩會的生存。但可以看出的發展趨勢是：「中國兩會在不同階段政治環境中，力圖不斷地增強兩會的宗教自主性」。這是筆者在本論文中想要去證明的核心觀點，在各章節中會充分說明。

### 貳、研究目的（研究預期效果）

根據上述之研究問題意識與編排的目次，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第一、探討背景性層面，包括中共對宗教的意識型態如何？中共的宗教政策如何？

第二、分析兩會內部自身的演變，包括宗旨的修改、三自愛國運動的性質之變遷、神學思想變遷、以及對信徒的各項教務工作等。

---

<sup>4</sup>此觀點請參閱本論文第五章「兩會與信徒的關係」中「三自愛國運動性質」之論述。

<sup>5</sup>此觀點請參閱本論文第四章「兩會與家庭教會的關係」中「結論」之論述。

第三、分析兩會與政府的關係，兩會與家庭教會的關係、兩會與信徒的關係、兩會與海外教會的關係演變等。

### 第三節、文獻回顧

在本節中，主要回顧趙天恩、梁家麟及邢福增等三位學者的論述。三位學者在研究現代中國教會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筆者首先釐清三位學者的學術觀點，之後會與筆者的論文做比較。另外，在台灣幾篇碩士論文中，左紹棠的論文觀點與筆者相似，最後稍微提到一下<sup>6</sup>。

就筆者觀察，台灣學者中，趙天恩長期致力於中國教會之研究與福音傳播，其所創辦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也成為研究中國教會的學術重鎮<sup>7</sup>。趙天恩的專書著作中，早期以研究中共宗教政策為主，以八六年出版的《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及九三年出版的《洞燭先機——中共宗教政策與三自會論評》為代表。書中詳細羅列中共於五十年代至今的宗教政策，包括黨中央的宗教政策，國務院頒訂的全國綜合性或單項行政法規，還有地方政府的綜合性或單項行政法規等。另外，趙天恩的重要著作還有《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一書，此書集結了過去一系列對中國宗教政策之研究，此外也清楚地按年代描述中國兩會發展及家庭教會的發展，是兼顧到黨國、兩會與家庭教會三方面的書籍。在坊間比較少有此類專書，對初踏入中國教會研究領域者而言，趙天恩的資料整理可提供很大的幫助。然筆者以為較可惜的是，因趙牧師對中國福音事奉強烈，所以比較以護教立場來撰寫，書中除質疑中共的宗教政策，也質疑兩會三自原則，進而想凸顯家庭教會在信仰上的正當性與代表性。對此，趙曾表示：「很多人誤解家庭教會傳道人的選擇，他們希望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能早日和解，彼此接納。但持這種意見的人過於膚

---

<sup>6</sup>左紹棠畢業於政大東亞所，論文為《中國大陸基督教政教關係——新制度論之研究》，2003年。其餘的三本為：王世方，《中共宗教政策研究》，輔大宗教所碩士論文，1994年。朱淑美，《中共基督教政策之研究：人民日報(1976-1995)的分析》，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戴伶珊，《丁光訓與三自運動》，輔大宗教所碩士，2000年。

<sup>7</sup>該研究中心原創於香港，於1997年遷台並更名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

淺，不是家庭教會不願意合一，而是對主忠貞問題」<sup>8</sup>。對三自教會與三自原則部分，趙亦曾表示：「兩會某些方面可以達到自養的理想，但從教會本身自主的角度看，卻非自治；而從向外宣教角度看，更非自傳。事實上，全國兩會並非福音性的，因為在三自會控制下，就不能自由地傳福音。所以，全國兩會是漠視三自原則，反觀獨立家庭教會才是真正實行三自原則」<sup>9</sup>。

姑且不論趙牧師的立場與態度，筆者認為他的研究中有幾項值得深思的：

第一、他認為中共宗教政策有一鮮明的發展曲線，而這曲線深受國內外環境影響。這曲線可分為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三大階段。五十年代，宗教處於被矮化的地位，中共的宗教政策相當緊縮。八十年代進入反左的黃金發展階段，中共宗教政策較為寬鬆。然八十年代末因著六四事件，九十年的中共宗教政策又轉為緊縮。所以，趙認為九一年的〈六號文件〉比起八二年的〈十九號文件〉鮮明地倒退許多<sup>10</sup>。然這觀點與梁家麟所認知的不同，以下將加以說明。

第二、根據文獻史料、對家庭教會田野的訪談，或是家庭教會主動提供的訊息，趙天恩充分地證明家庭教會在中國的處境非常艱難，不斷地遭受壓迫，長期與政府和兩會處於對立關係。書中常提到五十年代的王明道與倪柝聲、八十年代以李常受為中心的呼喊派，以及九十年代的李永澤、林獻羔等等。

再來，是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的研究。梁院長對於中國教會的相關著作頗豐，研究範圍也頗多元，跟筆者論文比較有相關的包括對五十年代三自愛國運動的定位，中共宗教政策的演變，農村教會的出現與發展，家庭教會的登記問題等等。筆者認為梁家麟院長的研究中有幾項值得我們參考的：

第一、中共宗教政策的變遷從八十年代以降基本上都是穩定的，九十年與八十年代

<sup>8</sup> 趙天恩，《洞燭先機--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會論評》，台北：中國與福音，(1993年)，頁4。

<sup>9</sup> 同上，頁239。

<sup>10</sup>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國福音會，(1997年7月)，頁549。

沒有重大差異。雖然過程中會有些內外環境的起伏，但大體而言，中共的改革開放的方向是穩定而持續的，這點跟上述趙天恩牧師的看法不同。進一步而言，梁認為，九十年代的〈六號文件〉是延續八十年代〈十九號文件〉之精神而頒定，所以沒有根本上的不同，核心精神都是有限度地容許宗教自由，但不同的是〈六號文件〉多了具體的規範性措施，例如宗教活動場所要依法登記，需得到縣級以上政府的同意方為合法。然，梁認為〈十九文件〉雖未有此規定，但地方政府自行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中都已經有相類似的規定了。所以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共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是穩定而延續的，並未受到國內外因素影響，所以很難看出有寬鬆與緊縮之別<sup>11</sup>。

第二、梁對五十年代的三自教會運動提出兩個觀點，打破中國兩會的迷思。梁認為，五十年代中共與三自會發起的三自運動與五十年代之前西方傳教士或獨立教會發起的三自運動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sup>12</sup>。此外，八十年代中國教會的蓬勃發展與五十年代進行的三自運動無必然直接關係，以打破五十年代教會的自我改造是形成八十年代中國教會發展的看法<sup>13</sup>。

第三、對家庭教會研究方面，梁近期的研究中著重在家庭教會如何取得獨立登記進而擺脫長期非法化的狀態。他認為，未來的大趨勢是家庭教會可以不用加入兩會，而直接向政府登記為社團法人，所以到時兩會就不再處於最高領導地位，而是充滿著各個獨立堂點<sup>14</sup>。然筆者對此有不同於梁院長的看見，在兩會與家庭教會一章中會有說明。

第四、對農村教會的出現與發展之發現。筆者認為這是梁院長有別於其他學者的研究中，最突出的一項學術貢獻。據他的分析，八十年代以後，農村教會在中國驚人地發展是相當重要的現象，這現象是六十年代後由平信徒自行發起的，與五十年代的獨立家庭教會並無相關。換言之，農村教會基本上是一個全新的福音復興運動，與之前的福音

<sup>11</sup>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3月)，頁263-265。

<sup>12</sup> 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不同詮釋〉，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年)，頁127。

<sup>13</sup> 同上，頁242。

<sup>14</sup> 梁家麟，〈有關家庭教會獨立登記問題的研究〉，氏著，《中國教會的今日和明天》，香港：建道神學院，(2006年10月)，頁42。

傳播沒有很大關連。而且，梁也發現農村教會的農民政治意識薄弱，教會的政治色彩不濃。他們不反對與三自會交往，甚至加入三自會。農村教會與三自會的關係是複雜的，並非對立的，此二者的關係是建立在現實問題之上，而不是政治意識或歷史問題<sup>15</sup>。

這類型的農村教會與所謂的家庭教會有別。雖然農村教會有家庭教會的形式或性質，但一般認為的家庭教會是指「城市與農村裡未登記又拒絕參加三自會的聚會點。此等教會大都是由五、六十年代受逼迫的牧者與信徒帶領。他們否定三自會，除有歷史因素外，更有神學因素」<sup>16</sup>。

最後談到學者邢福增的研究。邢福增是年輕一代中國教會研究的學者，著作也很豐富。有不少著作是在處理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而且有一貫性，從二十世紀前期開始到現今中國的政教關係。筆者認為邢福增的研究中有幾項值得參考：

第一、政教關係的研究。在針對二十世紀前期的研究中，邢福增以「救國實踐」為主線，分析中國信徒對改革社會、再造國家的承擔與努力，以徐謙、馮玉祥、張之江等三人為例<sup>17</sup>。二十世紀中期新中國建立後，邢試著以政府主導的基督教控訴運動之起源、發展與影響為主軸，描述黨國與教會的複雜關係<sup>18</sup>。邢並引用鄒讜的全能主義政治概念，認為五十年代的三自愛國運動領袖不得不接納黨國對基督教的改造，為的是尋求教會在新中國的生存空間，明顯看出全能政治介入基督教<sup>19</sup>。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政教關係起了重大的變化。邢主要從中國基督教協會(以下簡稱基協)成立的意義，基協與三自會的關係理順，還有兩會與黨國的關係理順來談中國教會的自主性訴求。他發現，因為兩會扮演官方(政治)與非官方(宗教)的雙重角色，形成愛國宗教團體與黨國間的既一致又衝突的矛盾關係。兩會在改革開放的新環境下，努力強調「教會化」，不斷

<sup>15</sup>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頁 51。

<sup>16</sup>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頁 52。

<sup>17</sup> 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 年 10 月)，頁 12。

<sup>18</sup>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黨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 年)，頁 16。

<sup>19</sup> 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頁 123。



地提出自主性方面的訴求<sup>20</sup>。

第二、對中國基要主義者的研究與平反。邢原本對陳崇桂等基要派人士參與三自運動給予負面評價。但作者研究後認為，陳崇桂等基要派人士參與三自會比起王明道等人堅拒三自會所面臨的挑戰是更大的，因為他們必須在不斷變化的政治情勢中做出抉擇，並且試圖在三自運動中為了發揚及保持基本信仰而努力<sup>21</sup>。

上述三位學者的研究貢獻當然不只於此，筆者只提出與本論文範圍相關的部份。筆者以為，趙天恩牧師著重在中共基督教政策與家庭教會的研究，對於兩會的發展與變化之分析似乎比較不夠深刻與全面。從《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一書來看，雖然每章都提到兩會的概況，而且也是從五十年代開始，但書中比較沒有統一的指標來衡量兩會的發展與變遷，所以只看到兩會各種現況的描述與分析，無法做出年代性的比較，進而看出兩會性質上的演變。然筆者認為，趙牧師在寫此書時原本立意就不是要做年代性比較，而是著重各時期兩會現況之史實陳述與分析。而筆者的論文比較專注在兩會的研究，不僅以五十年的時間來思考，也將範圍拉大到兩會與政府關係、兩會與家庭教會關係、兩會宗旨與神學變遷、兩會與海外教會關係、兩會與信徒關係等五大方面，並設定此五層面的衡量指標，以便看出兩會與政府、基層三自教會、家庭教會、海外教會的對應關係，以及每個年代變遷之實況與比較。

其次，在梁家麟院長的研究中，提到農村教會與三自教會的關係並非二元對立，而是複雜關係。筆者在論文中也發現到，兩會與政府的關係，兩會與家庭教會的關係都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多元且複雜的。然在梁院長的研究中似乎比較沒有著重在兩會本身的發展與變遷的研究。

在邢福增的研究中，已經發現到八十年代後的政教關係已經不同於五十年代的關係，也就是兩會的自主性逐漸增強，自主性訴求愈來愈多。這點的發現跟筆者的發現是

---

<sup>20</sup> 邢福增，〈中國教會與黨國的關係——八十年代迄今愛國宗教團體的改革〉，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頁64。

<sup>21</sup> 邢福增，《中國基要主義者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年)。

一致的。然邢福增單就中國基協成立的意義與價值、理順兩會彼此關係、理順兩會與政府關係等層面去研究，而筆者是從五個層面更廣地去分析。此外，筆者做的是三個年代的比較，而邢福增著重在於八十年代後整個兩會自主性提升的之分析與解釋，在各個年代的比較上不明顯。

所以，筆者認為針對兩會全面性、系統性、比較性之部分，是筆者可以補強之處，然三位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與觀點，給予筆者很大的幫助與啟發。

最後提到左紹棠的論文。不同於前面三位學者做的龐大的歷史文獻的分析，左紹棠用「代理人」、「國家統合主義」、「宗教市場」等社會科學理論來分析兩會、黨國、及家庭教會等三者的關係，這是他在論文上的貢獻。然左紹棠對兩會本身的資料使用上稍嫌不足，特別是能反映兩會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天風》之使用上稍嫌不夠，反而比較多使用趙天恩創辦的中福會所出版的期刊。例如，教產問題是兩會與政府對立的最明顯衝突點，在《天風》中有不少案例，然左紹棠文中第 82 頁似乎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到教會所面臨的問題向中共反應，其中包含教產問題。以此擴大來看整個論文的話，筆者以為在資料的提供與佐證上似乎可以再增強。而且，光是兩會與政府的關係中，所面臨的問題相當地多，若具體化、條例式地指出並說明，可能會讓讀者更仔細地清楚實況。例如，筆者論文第二章中提到兩會與政府關係的五大指標，包括個人信仰自由的抗爭、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問題、教職人員的認定、教產問題、宗教幹部不當干涉教會等都可以細部加以說明以便看出實況。左紹棠的與筆者的論文的結論確有相似，都證明兩會的自主性已提升。但因兩者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路徑、還有使用的資料重心不同、所以呈現出的論文也有不同的面貌，但彼此是可以相互呼應與補充的。

## 第四節、研究設計與實施

### 壹、研究對象

中國教會基本上分爲官方與非官方教會，本論文針對官方的「中國基督教兩會」作

為研究對象。

雖然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以非三自會的家庭教會居多，但礙於家庭教會的資訊一旦曝光就有被當局調查之疑慮，所以各個福音機構對研究家庭教會之資訊提供都很小心。再來家庭教會比較沒有統一的系統，各地差異極大，若要做研究，必須做個別區域的實際訪查比較有效力。所以現階段做家庭教會研究困難較多。

然而，中國兩會為官方認可的教會組織，無論在資訊上都比較公開、充分。也經過數十年的運作，兩會已經相當有組織，同時也比較願意開放讓研究者做訪談及田野調查。當然缺點是因礙於政府的監管，不見得能從兩會本身得到最真實的訊息。

## 貳、 研究方法

### 一、 文獻研究

本論文直接討論兩會本身的概況，取材必須是兩會本身出版的資料。所以與兩會直接相關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之取得與分析是本論文的重點。特別兩會近五十年的訊息集中在《天風》月刊、歷屆《全國基督教會議》資料、《金陵神學文選》、《丁光訓文集》等。有些資料在台灣沒有，必須親赴大陸或香港才能得到。

其次，為了避免失衡的狀況，筆者將從中港台三方的學者論述或資訊，比較客觀地看待中國兩會。台灣學者過往以趙天恩為主，反兩會之政治立場過於明顯。中國兩會本身的出版物與資訊又因中共牽制勢必有侷限。而香港學者的研究比起中國或台灣則客觀許多，例如邢福增、梁家麟等。

### 二、 操作性定義及各項分析「指標」

筆者先就本論文中提到的「政治性」與「宗教性」部分作操作性定義。「政治性」部分，兩會因為是隸屬於中共管轄的愛國宗教團體，必須直接面對中共的宗教意識型態、中共宗教政策、中共宗教事務當局等，因此必定會受制於中共一定程度的宰制與影

響。「宗教性」部分，兩會就性質而言是屬於教會的，勢必會推動各項有利於宣教發展的教務工作，以達成上帝的託付。中國兩會不希望完全被中共宰制，兩者關係不會是單一的零合關係，而是對立、合作、妥協等複雜關係<sup>22</sup>。在此錯縱複雜的關係中，筆者以為兩會的企圖與目標就是「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不斷地增強兩會的宗教自主性」，這是筆者想要的證明的核心觀點。

因此，本文在每章開始會設定幾項「指標」，在這些指標之下來看兩會的政治性與宗教性，進而證明本論文的核心觀點。每章的指標如下：

第一、在「兩會與政府關係」一章中，以「個人信仰宗教自由」、「宗教活動場所之認定」、「教會聖職人員認定」、「教會房產處理」、「宗教管理法制化」等五項為指標。

第二、在「兩會的宗旨與神學變遷」一章中，以「宗旨的政治性與教務性」、「三自的詮釋」、「基本神學議題的思考與反應」等三項為指標。

第三、在「兩會與家庭教會的關係」一章中，以「三自愛國原則」、「登記原則」等兩項為指標。

第四、在「兩會與信徒的關係」一章中，以「三自愛國運動性質」、「自傳工作」、「自治工作」、「自養工作」等四項為指標。

第五、在「兩會與海外教會的關係」一章中，以「交流原則」、「交流次數」、「交流對象」、「交流內容」等四項為指標。

### 三、 訪談

筆者實際接觸並拜訪過上海太倉基督堂的錢昌麟牧師(身兼太倉三自會主席及江蘇兩會的常委)，及剛從金陵神學院畢業兩年的代聖明傳道，並前往金陵神學院拜訪前副院長陳澤民先生。另外，在台灣方面，筆者也拜訪過與中國兩會互動密切的周聯華牧師。

---

<sup>22</sup> 此觀點請參閱本論文第二章「兩會與政府關係」之「結論」論述。

然，雖拜訪過上述傳道人，但比較遺憾的是，問題設計與回答可能不夠深入，受限於時間，以及受訪者的立場比較偏袒中國兩會，所以訪談的效果比預期小。但筆者以為，只要出於善意繼續交往與訪談，且時間充分的話，相信會得到不少收獲。且除了兩會人士之外，若能訪談到家庭教會的人士會更好，特別是針對兩會與家庭教會的關係，猶顯重要。

## 參、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研究範圍

就時間而言，無法從一個年代就看出中國兩會的宗教性與政治性之變化，所以本論文將研究的範圍為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此外，跟兩會相關的重要事務都納入本論文的各章節中，以期能以較大的視野，全面性地探討兩會的變化。

### 二、研究限制

第一、兩會出版的資料無法完整體現出兩會的實際的現況與困難，將是研究資料上的弱點。但希望透過其他非兩會官方的出版物來補強，特別是香港的期刊雜誌。

第二、因文中所討論的主題相當多，勢必也會有不夠深入的問題

第三、如上述所述，訪談的對象與內容會有偏中國兩會之限制。